

温胜军

解读“三个”温胜军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文 李焱 图

幸运温胜军

1977年秋天的甘肃玉门还是十分寒冷的,紧邻陇海铁路线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军垦车站附近,刚刚高中毕业参加工作的温胜军,作为一名园林工人正在给树木修枝剪杈呢。忽听收音机里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顿时温暖了他的心:“我要考大学!”

“你觉得恢复高考对你意味着什么?”“没有高考,也许我至今还依然是个园林工人,知识不仅改变了我们那一代人的命运,而且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

仰仗着刚刚丢掉的高中课本还保持着“余温”,仰仗着当时任中学副校长的父亲的辅导,温胜军成为全校参加高考的唯一的本科生,走进大学殿堂。从此告别了月薪只有28.23元的园林工人身份。

说起为什么考上哈尔滨电工学院,温胜军还真有点“宿命论”的感觉。“当时我就一门心思考回东北老家去,所以,填报的头两个志愿都是东北的学校,谁知,歪打正着,最后被哈尔滨电工学院调剂录取了。”

回忆这段往事,温胜军满脸的惬意,自称“名副其实”的温胜军确实温文尔雅,坦承自己是幸运儿。

思辨温胜军

思辨的温胜军总是把自己的思绪与当今的感受结合起来!

作为幸运儿,温胜军的大学还谈不上清贫。但说起来自湖北的同班同学(后来又成为他电缆厂同事)陈光高的大学生活,温胜军感慨万端:“当时,老陈家穷得,每月仅仅依靠20来块钱的助学金生活,大学四年他从未回过老家,条件虽然艰苦,但老陈还是顺利读完大学。”

谈到现如今清贫学子考上学却上不起学的尴尬,温胜军“忧心忡忡”地

在所有采访对象中,温胜军的“个性化”色彩也许最浓——1960年生人,在哈尔滨,1964年随父母落户甘肃,上大学又“杀回马枪”跑到哈尔滨电工学院,1982年毕业分配至郑州电缆集团有限公司,25年没动“窝”,满族,无党派人士。

于是,作为采访对象的温胜军在记者脑海里不禁幻化为“三个”温胜军。

财富,那是最好的素质教育手段啊,可眼下的孩子们被“题海”淹没,毕竟不利于素质教育。”温胜军刻意“强调”自己的一家之言!

平淡温胜军

在郑州电缆厂呆了25年的温胜军,现在“官”至公司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只是一个小小的中层干部。但20年如一日,温胜军依旧心静如水。

“既然我学的就是电线电缆专业,所以就没有想到过升官发财,踏踏实实搞好自己的专业,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温胜军实话实说。

20多年来,温胜军组织和参与了数不清的大小新产品项目开发。其中“拖曳诱饵电缆”获得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去年底推出的“耐热型扩径母线”电缆,已在今年大显身手,目前已实现销售收入400多万元。

“技术中心就是企业发展的发动机、助推器,我作为部门负责人,就是要带领大家快开发、多开发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新产品。”正是这种信念深深扎根于温胜军脑海里,这两年,他淡泊名利,率领他的团队推出了一个又一个新产品。他说,当看到自己研制开发的新产品从车间运到全国各地时,那才是最开心的事情。

其实,在电缆厂20多年,温胜军也有几次“发财”机会,一些企业许诺重金聘请他出山,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为选择而奋斗,我视名利淡如水,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心里踏实!

对生活,对工作,温胜军始终有颗感恩的心。他知足地告诉记者:“现在,我是企业中层干部,高级工程师,家庭美满,父母健康,女儿是中原工学院的大学生,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党和政府,感谢30年前那个命运之神”的安排。



温胜军,毕业于哈尔滨电工学院,现任郑州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

感言:
不恢复高考是万万不能的,但考大学也不是万能的。人生之路关键是把握好自己,把握好机遇。

袁锡泉

地层深处的“孺子牛”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文 陈靖 图

参加高考的小木匠

1977年8月份的一天,19岁的袁锡泉已经是尉氏县岗李乡的一个出师的木匠。一天早晨,他正和乡亲们正在解放军测绘学院的工地上做木工,收音机里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搅动了他那本不安分的心。他最担心的还不是水平问题,而是发愁:像我这身份有没有资格报考?

“我的家庭背景非常复杂,一言难尽。”袁锡泉“犹抱琵琶半遮面”地透露着自己的家境:父亲曾是北京师范大学1948届的毕业生和学校地下党员,接管过北京新华印刷厂。后来,由于突如其来的变故,先是丢了党籍发配到东北,后是带着一顶右派帽子,“灰溜溜”地携妻将子被打回老家去。本来就是地主出身,加上是右派之子,所以,当时的“地、富、反、坏、右”五顶帽子几乎全戴到年幼的袁锡泉头上!从小学到初中,袁锡泉年年被班上评为“三好学生”却年年通不过学校这一关。1972年,正当他为上不了高中发愁时,幸亏邓小平出山,搞了个“教育回潮”,他才有幸上了高中。上大学不敢想,索性就从小学了谋生的手艺:木匠。

其时,远在百里之外的老父亲也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专程来到郑州说服儿子:“我估摸着按照新的政策,你是可以参加高考的,孩子啊,只管报名,就是考不上也可以为来年再考试积累经验啊。”于是,袁锡泉辞掉木工活,回到老家,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复习了一个月的时间。结果成绩下来,只有166.5分,仅仅比164分的中专录取线高出两分半,处于录取的“生死线”边缘。作为农家子弟,就是中专也得得上!袁锡泉专门挑煤炭、地质、农业、水利等“低档学校”填报志愿。后来,他被焦作煤校录取了,学的是地下开采专业。老父亲宽慰他:“既然咱是科班出身,将来就不会让你挖煤,至少是管理人员,能当个工程师就是崇高目标。”

郑煤集团芦沟矿的常务副矿长袁锡泉,是本报此次圈定的30个采访对象中为数不多的中专生。所以,当记者出现在袁锡泉面前时,他先是“惊讶”,继而平静:虽然我当初只考上个中专学校,但我同样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没有高考,我这个当初的农村小木匠,就不会变成今天的工程师!

温柔敦厚的袁锡泉讲述着30年前的往事,绝对是原汁原味,没有任何“作料”和“拔高”。他还自我解嘲地说:“也许冥冥之中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体检时,我平生第一次去60多里外的县城,一不小心掉到水沟里,弄得两脚黑泥,我想,坏了,这辈子肯定要做‘煤黑子’,结果还真的应验了!”

扎根郑煤27年

“1980年3月27日,我从焦作煤校毕业,被分配到新密矿务局(郑煤集团的前身)生产技术处,尽管只是个中专生,但那时可是很尊贵啊,矿务局所有党政领导排队欢迎我们,还舍不得让我们下井。”思绪闪回到27年前,袁锡泉对郑煤尊重知识这一幕记忆犹新,感激涕零。

参加工作27年,可袁锡泉的履历表却十分简单,只有两行字:1980年—

2005年,在局生产技术处工作,其间入了党,提了干,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最高职务,副处长;2005年至现在,芦沟矿常务副矿长。

正是毕业分配享受到“高规格”欢迎仪式那一幕,让袁锡泉暗自发誓:领导这么看重我,我一定要干出名堂,一定要成为煤炭开采和安全方面的技术“大拿”。说归说,真正做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文凭太低,工作中遇到不少“拦路虎”,办法只有一个字:学!1982年,袁锡泉重新“回炉”,开始读焦作矿院的函授本科。谈及这段往事,袁锡泉自揭“隐私”:“为了上函授,我连续三年‘不敢’结婚,直到1985年,我这个27岁的大龄青年才成了家,这在当时绝对算是晚婚了。”

按照规定,他每个月必须下井15次,郑煤的矿井深度大多在250米左右。记者好奇地替他算了算:27年间,他光是在地层深处上上下下就是2500公里。学习加勤奋使袁锡泉的专业知识与俱进,管理经验不断丰富——1994年,在他的组织下,郑煤率先在全煤系统实现了由炮采分层开采取代放顶煤开采的老黄历,单产水平由原来的每月1.9万吨增加到4万吨,且井下安全系数也大大提高;此后,他组织负责的井下支护工艺改革,把传统的摩擦支柱提升为单体液压支柱,又是全煤系统领先,百万吨死亡率几近于零;他主持进行的劳动组织高产高效改革,又使工效从原先的每工7吨提高到每工15吨……对于这些很专业枯燥的数字,也许平常人很难读懂,但对于袁锡泉来说,那可是莫大的成就感!

在郑煤集团一呆就是27年,袁锡泉不仅下遍了所有矿井,而且对井下的巷道、地形地貌、物料摆放了如指掌,历历在目。袁锡泉动情地说:“27年的心血、感情已经渗透到煤层里头了,今生今世,我的煤炭情结是绝对挥之不去了!”说这话时,袁锡泉不是慷慨激昂,而是心静如水,充满了岁月的历练和沧桑。



袁锡泉,毕业于焦作煤校,现任郑煤集团芦沟矿常务副矿长。

感言:
虽然我当初只考上个中专学校,但我同样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没有高考,我这个当初的农村小木匠就不会变成今天的工程师!